

GUODU SHIQI

ZHONGGUO MINZU ZIBENZHUYI DE LISHI MINGYUN

过渡时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张玉瑜 著

学林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资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12JD710036)

过渡时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张玉瑜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 张玉瑜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486-0421-1

I. ①过… II. ①张… III. 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1949~1956 IV. ①F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7078 号

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作 者—— 张玉瑜

责任编辑—— 钱丽明

特约编辑—— 李保俊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25 万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978-7-5486-0421-1/K·39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在夹缝中求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1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1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1
二、外国资本的入侵与中国近代工业	5
三、19 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生产关系	8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15
一、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15
二、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19
第三节 历尽兴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24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	24
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27
三、二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陷入困境	31
四、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终极	36
 第二章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政策的演变	43
第一节 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全面实施	43
一、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完善	43
二、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实施	47
三、没收官僚资本与国营经济地位的确立	49
第二节 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54

一、新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54
二、“利用、限制”政策的酝酿和提出	57
三、“利用、限制”政策的历史作用	62
第三节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	66
一、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困境	66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	68
三、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新变化	72
第三章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转折	75
第一节 建国初期反对扰乱市场的斗争	75
一、建国初期的物价波动	75
二、反对市场投机的斗争	78
第二节 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82
一、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	82
二、开始向资本主义的进攻	86
三、资本主义的威风“扫地以尽”	89
四、开始酝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93
第三节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存状况	98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98
二、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竞争	102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	106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112
第一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战略思想	112
一、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确立	112
二、党对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116
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122
一、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党的立国思想	122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	127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30

第三节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	133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133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136
 第五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14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前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141
一、1953 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情况 ·····	141
二、1953 年初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 ·····	145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	152
第二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	157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制定·····	157
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162
三、关于和平赎买政策的实施·····	168
第三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79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掀起·····	179
二、公私合营进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	186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91
四、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就和问题·····	199
 后记: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消失的历史反思 ·····	205
一、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基本上丧失了独立发展的空间 ···	206
二、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逐渐走向消亡的历史动因·····	208
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211
四、“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	214

第一章 在夹缝中求生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产生于两次鸦片战争后的 19 世纪 60、70 年代,初步发展于甲午战争后,进一步发展于 20 世纪初,短暂繁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的间隙,步履维艰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格局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的进步方向,但由于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和排挤,它始终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而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生。抗战胜利后,民族工商业有过一定的发展和短暂的繁荣,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战后民族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民族资产阶级力图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的破产,印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悲惨的历史境遇。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尊重和维护资本和财产的私人占有。同时,资本主义又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者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制度。这种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

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初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使资本主义的要素得到解放。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例如威尼斯)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各个小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和劳动能力是不同的,他们生产同一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也不一样,而同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是按大体相同的价格出售;这样,那些生产条件好的赚了钱,逐渐富裕起来,而生产条件差的赔了钱,日益贫困。两极分化的结果,总是多数人陷于贫困,以至破产,失掉了生产资料,靠给别人当雇工过活;而少数富裕户逐步购置生产资料,以至雇工劳动,逐步变成剥削者,变成资本家。

除封建社会内部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外,工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还有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者这一途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商人或手工工场主约定向小生产者收购产品,变成包买主。这种包买主又利用小生产者的困难,向他们贷放货币或原料,以至把原料发给小生产者,使代为加工,付给计件工资。实际上,包买主就变成雇工生产的资本家了。

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学者对本题的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然而由于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含义及其存在的条件有不同的理解,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也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出现于北宋,也有人上溯至唐,以至更早。多数学者则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或其起点,大致产生于明中叶,到清中叶有了发展。

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般是从生产力水平、产品的商品性、自由雇佣劳动的规模等几方面进行的。但因史料多简略,学者在考证、解释上有不同见解,因而对萌芽经济实体的确认互有参差。比较严谨的研究认为,在明中叶,多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不断出现;至清中叶,继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不断有所蔓延:

(一)江南丝织业。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手工丝织业历史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页。

久,“明成化末年,江南机户有的由一张织机发展到二十余张织机的丝织手工业作坊”已不断出现,^①所产绸缎运销国内外,较早产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主和包卖商。另据上海《申报》记载,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丝织业发展更为迅速,南京丝织业拥有织机总数达5万余张。苏州的丝织业虽不及南京,但全盛时期也拥有织机三、四千张,织工总人数在万人左右。^②连后起的江苏吴江县震泽、盛泽等丝织业市镇,也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资本主义萌芽。

(二)广东佛山镇铁器业。佛山的铁器业在明代已相当发达。至清康熙年间,佛山冶熟铁场有数十肆,人有数千,每肆有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所谓“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③佛山成为国内外贸易的重地,市面繁荣程度超过广州。乾隆末年,佛山全镇有“烟火十余万家”,人口总数当有数十万,其中以铁器业为中心的手工业工人占有较大比重。佛山铁器业包括铸锅业、炒铁业、铁线业、铁钉业和土针业等行业。炒铁业的范围不小,全盛时期设有炒铁作坊数十家,每家又都有数十个炒铁砧,每砧要用成年工人三、四人和辅助童工十余人,每家炒铁作坊拥有工人数当在百人以上。铁线业的手工作坊也有十余家,工人达千余。根据各种记载,鸦片战争前后,佛山铁器业的手工作坊主与工人之间,已远远超过封建行会关系,而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三)陕西汉中一带的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陕西汉中一带,北有终南山,南有大巴山,汉水和嘉陵江流经其地,因此在那里出现了与山、水有密切关系的冶铁业、木材业和造纸业,这些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前已具有较大规模。例如在木材业中,“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挂记账目经营包揽承赁字据曰书办,水次领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而这些“当家、领岸、书办、包头均木厂小伙名色”。这些组织和支配木材业的厚资商人,不能不带有手工业资本家性质。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的匠作工人,则大都是不事农耕的客籍流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因此,这些行业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也是很明显的。

① 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② 《申报》光绪十二年2月16日(1886年3月21日)。

③ 据《广东新语》卷15,“货语”。

(四)江西景德镇制瓷业。江西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历史悠久,产品精良。乾隆年代任江西窑务监督的唐英曾描述:“景德一镇,僻处浮梁,邑境周袤十余里。……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藉瓷为生。”^①可见在清乾嘉年间,景德镇的制瓷业除官窑而外,已是一个拥有民窑二、三百处、陶户数千家和工匠数十万人的巨大手工业中心。根据各方面的记述,至鸦片战争前后,景德镇民窑窑主与生产工人的关系,虽然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行会性质,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已是显而易见了。

(五)四川自贡井盐业。四川自贡井盐业,包括自流井与贡井两个盐区,又称富荣盐场,是四川井盐中心产区之一。过去食盐生产长期由官府控制,私井很难发展。明代后期控制有所松弛,私人灶井有所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初,“任民自由开凿”,^②井灶大兴,乾嘉时期便进入手工工场阶段,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基本特征。至鸦片战争前后,自贡井盐业已有相当规模,共拥有卤井数百口,煎锅近两千,年产盐一亿斤以上。当时在自贡以盐业为生者“以数十万计”,可见这时期的自贡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以盐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区了。在此基础上,经营自贡盐井的手工工场主,也逐步发生分化出现了王、李、胡、颜四大资本家族。其中的“李四友堂”李家,全盛时期拥有职工两千余人。这几家资本家族,同时还兼营商业,有的还是大地主。

(六)上海沙船业。沙船是中国沿海的主要运输工具,历史悠久,性能良好,原由官府控制和运用,民间很少经营。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货运的频繁,私人经营的沙船逐渐增多。上海襟海带江,地处南北商货交换中心,因而沙船业特别发达。清乾隆年间,上海已是“南北物资交流,悉籍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③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总数已达三千五、六百艘,总共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④ 经营上海沙船业的都是私人船商,称作

① 转引自光绪《江西通志》第93卷,经政略陶政。

② 吴炜:《四川盐政史》,第1页。

③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④ [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沙船主。这些大沙船业主雇工人数之多,规模也非一般。

此外,在有些矿业中,如云南的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北京近郊的门头沟煤矿等,也程度不同地呈现着一些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这一资本主义萌芽,尚未能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和诞生资产阶级,但它毕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赖以产生的重要社会条件。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并不太迟。但其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仍只是稀疏地存在,未能像西欧那样导致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到来,在农业中更属微不足道。其发展缓慢的原因,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走向,毛泽东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曾作出论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二、外国资本的人侵与中国近代工业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并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只能靠为人佣工过活的劳动者,又需要有大量的可以作为资本的货币财富。小生产者的分化是比较缓慢的,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西方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单纯依靠这种经济关系的自发演变,而是借助于暴力。新兴贵族和资本家借助于国家暴力杀戮、掠夺、征服等手段,剥夺小生产者,特别是剥夺农民,造成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②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方式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引起的。18世纪后半期,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就竭力向中国推销商品,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他们的工业品仍不能打开中国的商品市场,只能偷偷运进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来掠取中国的白银。这是因为中国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38页。

耕女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对外国工业品具有很强的抵抗力。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扭转中外贸易的逆差,不得不依赖用暴力来打开中国市场。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他们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通过杀戮和征服,他们掠取了大量赔款和其他财富,获得了政治、军事、经济各种特权,并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随着帝国主义的掠夺而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剥削、搜刮的加剧。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就不断增加田赋和盐价,并开征厘金(通过税),实行勒捐,又铸大钱,滥发官票、宝钞和银行钞票。地方统治者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不可胜数。在国家暴力的横征暴敛下,豪绅地主的社会暴力也更加猖獗。他们增加地租、押租和高利贷利息,强行夺租、夺佃、兼并土地。这一切都促使大量农民破产,千百万小生产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据1853年记载,广东顺德因洋纱洋布盛行,土机“女工几停其半”。^①接着洋纱洋布向内地倾销,其他手工业也遭受到打击,如洋铁代替土铁,煤油代替树油和土烛等。同时,帝国主义大量攫取丝、茶等农产品出口。例如:丝,原是养蚕、缫丝在同一家庭内生产,后来则是将茧运到口岸丝厂,由洋行监制出口。茶、大豆等也有类似情况。这样,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许多过去农民自制自用的东西要到市场上去购买,生产的工业原料也要在市场上出卖,因而扩大了商品市场。在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的贸易掠夺和国内封建制度的各种剥削、压迫下,农民和手工业者贫困破产,流亡城市,这就提供了劳动力市场。这都给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一些客观条件。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②

^① [清]冯奉承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三。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7页。

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合法化,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更是长驱直入。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工矿业、财政金融、交通贸易几乎全部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控制的同时,还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共同压迫中国人民,他们先是支持腐朽不堪的清政府作为其在华的代理人,清王朝覆灭后,又先后扶植各派军阀势力,造成中国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扶植,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腐朽的东西得以继续保留下来,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产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生产方式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日趋瓦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在“平内寇”、“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方的设备和自然科学,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一部分华侨、地主、官僚、商人、买办开始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100多家。如:1872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开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开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1886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叶澄衷创办的燮昌火柴厂和徐润兄弟创办的同文书局等。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构成来看,主要以机器缫丝业为主,其次是食品、火柴、印刷等工业。这表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首先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掠夺农副产品和倾销商品的需要,然后才是面向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以轻工业为主,一般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1894年以前,中国民族资本总额仅772.5万银元,而同一时期的外国资本则达5433.5万银元。^①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极为仇视,他们一方面通过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又利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挤垮与吞并中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生存受到威胁。以至于许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外国资本的挤压下,创办不久就失败和夭折。如:上海、厦门等地的火柴制造业,因无法与外国输入的火柴竞争,相继倒闭,仅燮昌火柴厂还勉强维持,但营业十分困难。1875年福州成立的三个砖茶厂,在俄商竞争下,仅一年时间就倒闭两个。1882年成立的上海玻璃制造厂,1888年被英商福利公司吞并。到甲午战争时期,原创办的100多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只剩下74家。

三、19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生产关系

19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三种生产关系:帝国主义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生产关系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剩余价值剥削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们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又各有其特点。

1. 外国资本

帝国主义资本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资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归外国垄断资本家所有,外国资本凭借殖民主义特权,剥削中国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代表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国际资本在殖民地的生产关系。

在跨入近代社会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运转,已经处在机能衰老的时期,国势也日趋衰微。此时,以英、法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迅速发展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海外殖民地侵略和掠夺的基础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的中国早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虎视眈眈的对象。他们先是用鸦片劫掠中国的财富,继而又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序幕。侵略者用炮舰威力强迫昏庸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夺了大量权益,把中国一步步推入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经济方面,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

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长驱直入,侵入中国。1842年到1899年的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列强强迫中国开辟了45个通商口岸,向中国大肆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促使中国旧式手工业大量破产,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为了适应商品输出的需要,外国资本主义还在中国投资设厂,设立轮船航运业,开办银行,进行少量的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后,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合法化,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资本输出额由战前的2亿至3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02年的15.1亿美元。^①以资本在1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大型工矿业来计,1840年至1894年为23家,各家创办时的资本总额共为7631千美元,1895年至1913年增加到136家,创办资本为103153千美元,后者为前者的13.5倍。^②外资企业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其中煤矿、造船和纺织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直接投入中国市场,牟取暴利,排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

银行是帝国主义进行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因而扩张非常迅速。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银行共有8家,分支机构16个。“1895~1914年间,新设的欧美银行约有10家,分支机构40余处;另有日本在华银行和中日合资银行,连分支机构近30处”。^③这些外国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买卖,通过拆款等手段,控制中国的钱庄,大量发行纸币,吸收民间资金,而且还争相为清政府承办政治性贷款并借机控制中国的财政。

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增长也很快,早在甲午战争前,外国轮船公司就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业,甲午战争后,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到1911年进出中国通商口岸的轮船吨位,外轮占84.4%。铁路运输中,帝国主义更是居于垄断地位,1911年中国共有铁路9600多公里,帝国主义直接经营和控制经营的占8900公里,为总长度的93.1%,中国能够自主运营和控制的铁路为700公里,只占6.9%。在此期间,帝国主义不仅没有因为资本输出的增加而放松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反而进一步扩大。各国在华经营贸易的商人及商行急剧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5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增多,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政治特权的保障,不仅控制中国国内市场主要商品的贸易,而且还经营中国 90% 的进出口贸易,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中国进出口商品的具体内容。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巨额入超,加重了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上其他需要,迫使清政府不断举借外债。据统计,截至 1911 年,清政府举借外债累计超过 12 亿两白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命运陷入到万劫不复的轮回之中。

2. 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是帝国主义资本的衍生物和附庸。它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控制者,从清代洋务派起,就一批仰仗于外国资本的封建大官僚,是为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服务的政治代表。因此,它是一种买办的生产关系。毛主席指出: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①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方面是兴办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从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官僚、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运动。可是,也要看到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

自鸦片战争后,许多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如继续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顽固封建观念,只会使中国继续落后和挨打。因而提出了“古今之变局”和借法自强的理论。这样,在 19 世纪 60 年代便产生了一股新的开放式的洋务思潮,即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这种新思潮比过去那种封闭式的以海防为中心的“夷务”论前进了一大步。正是在这种新的舆论和内外压力下,产生了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洋务运动。所以,中国近代工业的首创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热衷于洋务的清朝官僚,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洋务派不仅首创了中国近代工业,而且在生产规模和资本总额等方面超过了当时的民族资本企业,也优于外国在华企业,在整个近代企业中占主要地位。如洋务派企业资本占三种类型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 45.22%。^② 我国最早的钢铁厂、造船厂、机器制造、机器采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46 页。

^② 根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有关资料计算而成。

矿以及纺织厂都是由洋务派开始创办的。近代铁路、航运等交通业也都是由洋务派所开创。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封建国家里,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和形成的条件下,洋务派官僚运用政府巨款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创办起中国自己的近代工矿业,实行技术变革,应该说是反映和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方向,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事业。它与当时反对开放,闭关锁国,保持古老封建经济的顽固派相比较,无疑是进步的。

总之,中国早期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的出现,是我们这个封建古老的国家向近代工业国家转变的起点,它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外国的军事、经济侵略也起过一定的抵制作用。

民国时期,国民党执政以后的官僚资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垄断资本,即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本;二是蒋、宋、孔、陈和其他官僚、军阀所有的私人资本。毛主席在1947年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①

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国家垄断资本大抵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一般垄断然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国民党执政以后的官僚资本,则是利用了中国的工业落后和自由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由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运用政治以至军事的暴力,强取豪夺,直接造成国家垄断的。它不但具有严重的买办性和封建性,还具有军事性质,它是为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不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而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原是北洋军阀的两大金融支柱,国民党政府通过加入“官股”和改组有关机构,将其股权、人事权等控制起来。随后,又成立了“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开始时称“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国民党政府还将原先附设在邮政局中的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并由中央银行拨款成立了中央信托局。这样,就形成了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